

怀念吕老

刘 宣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七日凌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坛上一颗明星殒落了！——当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听到吕振羽同志逝世的消息时，心情无不十分沉痛。特别是早在东北解放区时就认识了他，而近年来又多次亲聆过他教诲的我，更是悲悼不已！我怎么也无法相信：就在逝世的几个小时以前，他还亲自答应为我们的《文献》丛刊撰写批判封建主义的文章，而几小时以后，崇敬的吕老竟然同我们永诀了！

吕老是我们刊物的顾问。自刊物创办以来，一直得到吕老满腔热忱的支持。每当我们登门拜访的时候，他从不顾念自己病弱的身体和繁忙的著述活动，总是热情地接待和指导。我们向他约稿，他立即拿出过去蒙冤幽禁时所写的《学吟集诗草》和录出腹稿《狱中惊闻少奇同志蒙冤感怀三首》。这些诗稿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作的，体现了吕老作为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他的诗作在本刊上发表后，读者称赞他以深陷囹圄之身，竟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而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辨诬，真不愧为当代的“董狐”！

吕老多次希望和鼓励我们要把《文献》丛刊办得富有特色，更好地为繁荣我国的社会科学服务。当我们把要在刊物上开辟专

栏、登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的传略，以激励青年一代向社会科学进军、交流治学经验和积累学术资料这一想法告诉吕老时，他立即表示支持。前不久，吕老因患重病住院治疗。刚刚回到家，我听说他准备撰写《自传》。在他逝世前夕，我去访问时，还看到他和夫人江明同志正在冒着盛夏的酷暑修改《著作系年稿》。吕老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然而他从不以此自矜，特别是如此热情地关心我们的刊物和精心为我们撰稿，更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在旧史学的莽莽荒原上，吕老披荆斩棘，为开拓和创立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就撰写和出版了《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中日问题批判》、《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在他这些著作中，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我国原始社会的特点及内部规律，提出了殷商奴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论证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性质和我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等等。有力地批驳了托派、汉奸、日本法西斯主义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御用文人的反动谬论，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并以之捍卫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后来，他又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著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简史》，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一九六三年，正当他要进一步为发展我国史学作出新贡献的时候，横祸飞来，蒙受不白之冤。在被幽禁的日子里，他仍不肯放下那支生花的妙笔，几年之间凭借着仅能看得到的一、二份报纸，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史学评论文章和三千首充满豪情的诗词。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他在《甲辰元旦试笔》一诗中写道：

脑力衰頹羨岁华，倔强犹欲看锥花。
近今史事须雕续，往日哦吟待选拔。
民族余篇胸有数，哲人补述尚多家。
卅年假我殷勤学，夫妇同窗愿不赊。

——其一

如矢驹光痛逝波，川流不再奈谁何！
五洲革局途还远，万类究穷体更多；
人事班班相永续，文明段段会长河。
高于共产知何似？完美更超共产歌。

——其二

身处逆境，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历史科学事业。他是多么想回到自己的旧居，和江明同志一起，再拿起“锥花”之笔，从事“万类究穷”的史学研究，向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贡献自己的才智！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位蒙受十二年幽禁摧残、年近八旬的老人，按理说可以安度晚年了。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扬“老骥伏枥”的精神，重新投入了战斗。一九七九年初夏，他们一家刚刚迁回旧居，我们就前去访问了他。当时，他的旧居因长期被占、毁损严重，需待修葺；刚刚退还的书籍和手稿也有待于整理，环境显得还很零乱；并且吕老又患脑血栓病，半身瘫痪，亟需疗养。但是，他已进行著述活动了。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情，劝吕老先要保养好身体。但是江明同志说，“不让他从事著述是办不到的，这是他几十年的习惯。过去，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山城重庆，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他都是这样工作的。《中国民族简史》一书的著述就是解放战争期间从哈尔滨去大连，途经朝鲜新义州，坐在‘榻榻米’上动笔的。……

粉碎‘四人帮’后，他就更加放不下自己的工作！”的确，旧作需要修订，为“四人帮”一伙颠倒了的历史科学需要恢复本来的面貌，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又摆在他的面前。吕老是多么珍惜自己的有生之年呀！但是，当这位老战士刚刚迈上新的征途时，他的生命竟然被无情地夺走了！

他的老战友陈继周(即廖化)同志生前在一首诗中，曾称赞吕老：“卅年史界乱如麻，议论纷纷一着差；谁似先生凭只眼，早标马列汇诸家。”吕振羽同志正是这样一位具有马列慧眼的无产阶级史学战士。十年浩劫中，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一伙为了构陷刘少奇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从预谋的幽禁中又把他投进监狱，威逼利诱，妄图从他口中得到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所谓“罪证”。作为一代良史的吕振羽同志，宁以身殉，也决不肯做出违背历史真实的事情。他不为势倾，不为利诱，同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愤怒地高喊：“打倒伪造历史的恶魔！”“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在狱中得悉少奇同志被永远开除出党，十分惊愕。他缅怀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立下的卓越功绩，目击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一伙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的罪行，义愤填膺，默成感怀诗三首，以“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辨诬董狐篇”的激昂诗句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鸣冤辨诬。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但是坚决反对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坚决反对在史学研究中推行“两个凡是”观点。他对江青一伙的“影射史学”，深恶而痛绝。当他们批“当代大儒”时，企图拉吕老出来写文章为他们帮腔。但是，身陷囹圄的吕老断然拒绝：“我向来对孔子是两点论，对秦始皇也是两点论。”他就是凭借着马列的“只眼”，识破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一伙的鬼蜮伎俩，爱憎分明地谱写党和人民

所经历的这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吕老不仅在政治上看问题敏锐，学术上勇于探索，而且一贯生活俭朴，对自己和他的家人要求很严格。过去，我早就听说吕振羽同志将数以万计的稿费捐献给党，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十年浩劫中，他们一家的生活遭到了困难，直到他的《咏史诗》在本刊发表时，生活依然不很充裕。但当我们送去稿费时，他仍然拒绝接受。江明同志对我说：“写文章不收稿费是振羽同志向来的规矩，多少年都是这样的。他常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从事著述活动，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接受一定的稿费报酬，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吕老认为他写文章不是为了金钱，这充分反映出他高尚的风格。

吕振羽同志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二十七岁自述》一诗中，叙述到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时，写道，“识破邪门非正道，卡伊(即马列)主义世无伦。而今而后知所勉，誓为穷乏竭此身。”他以自己的一生履行了光辉的誓言。

吕振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八〇年七月

望海潮 悼吕振羽同志

于乃义*

《文献》创刊，曾载吕振羽同志《咏史诗八首》，随又发表《狱中惊闻少奇同志蒙冤感怀三首》，读之，深感吕老史笔诗心，文献典范，敬佩良深。近日传来讣音，惊悉吕老已成永诀，梁木摧折，耆献何征！我心悲怀不能自已，爰述悃忱，托之倚声：

溯殷周史，探奴隶制，煌煌巨著薪传。揭秋泽修①，斥陈伯达，是当代董狐篇。鉴往以瞻来，九州民族志，融会精研。我读宏文，论神交，卅有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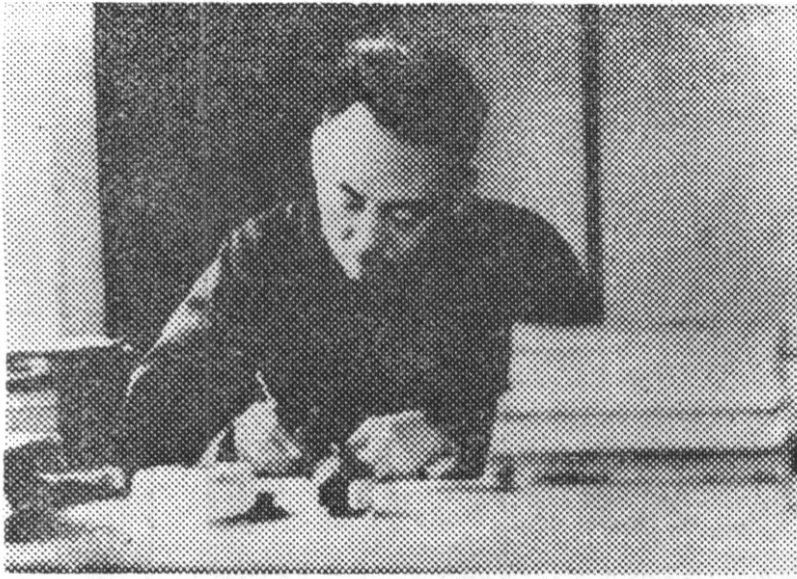
岂忧十载沉冤？！正颂扬祖国，奋写三千。彩笔创新，谦称“急就”②，韵歌雅乐诗笺。谁颠倒忠奸？得吕公椽笔，真伪昭然。留下未完伟业，含笑付今贤！

①指日本法西斯御用学者秋泽修二。他曾在其《支那社会构成》和《东洋哲学史》两书中肆意歪曲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鼓吹侵华有理的强盗逻辑。吕振羽同志撰文予以抨击。

②吕振羽同志蒙冤幽禁中，用旧报纸写下三千首诗词，其中长歌《祖国颂》前言云：“此篇之作，意欲以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史之新‘急就篇’，以便于群众，尤其是青年阅读，期能发挥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为史学开创新体裁，《咏史诗》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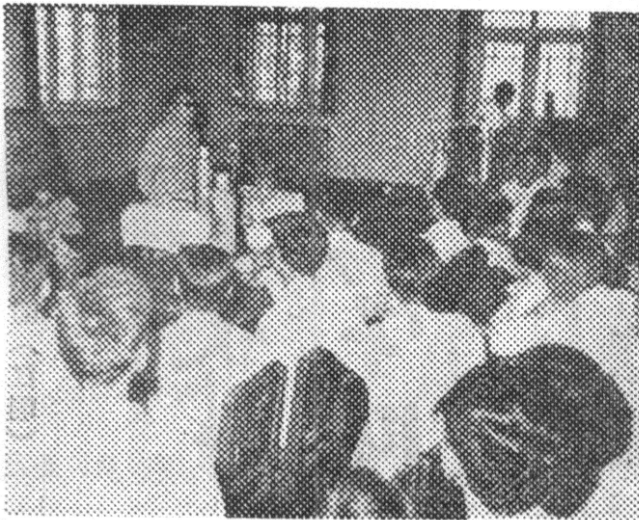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七月于云南省图书馆

*于乃义同志为本刊编委。



左上图：吕振羽同志一九四七年
在大连撰著《简明中国通史》（下册）。
张爱萍同志摄

右图：一九五五年，吕振羽同志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东德莱比锡举行的东亚学会议。图为在开幕式上致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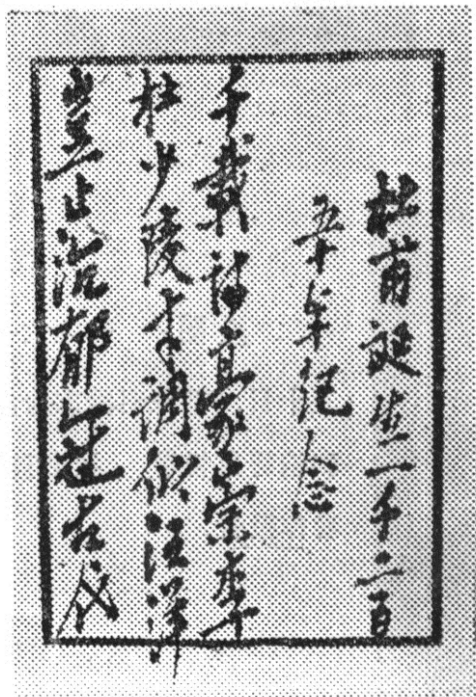
左图：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吕振羽同志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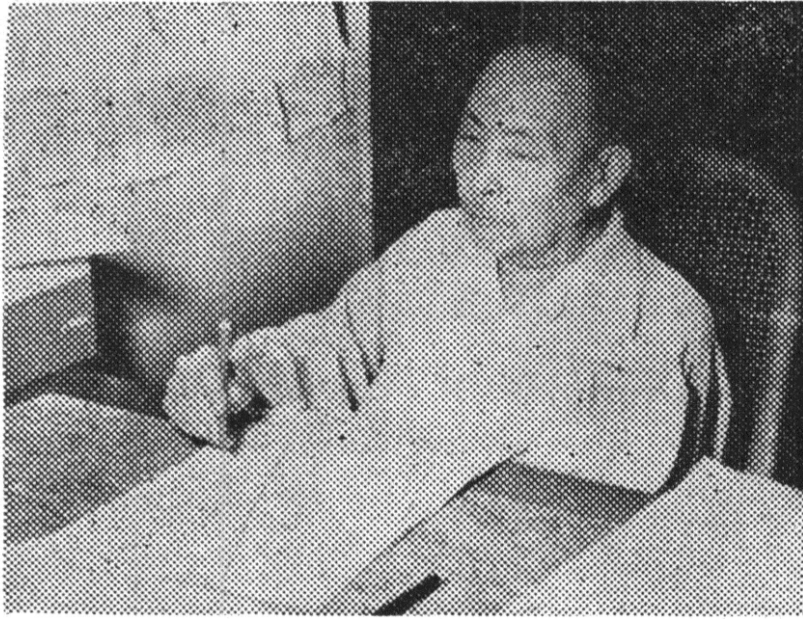
上图：一九六一年七月，吕振羽同志（中坐题字者）和范文澜（右立戴帽者）等同志参观内蒙古博物馆。



左图：吕振羽同志题赠时真即（江明）同志对联手迹。



右图：吕振羽同志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年纪念赋诗手迹。



左图：一九八〇年六月，吕振羽同志修改《史学评论》书稿。



左上图：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吕振羽同志和夫人江明同志摄于武汉。

右下图：一九八〇年六月，

吕振羽同志和江明同志讨论即将出版的《史论选集》序言。

